

趙城金藏

總目錄

趙城金藏

丁亥選中題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新學堂
PDG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趙城金藏 / 佚名著.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13-3597-8

I. 趙… II. 佚… III. 佛經—中國—金代 IV. B9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201862 號

責任編輯: 高柯立

裝幀設計: 李洪波

ISBN 978-7-5013-3597-8



書 名: 趙城金藏

出 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100034 北京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玉成古籍印裝廠

開 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 張: 6481

字 數: 300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5013-3597-8/B · 119

定 價: 56000.00 圓 (全 122 冊)

新華書局
PDG

《趙城金藏》研究（代序）

李富華（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一、《趙城金藏》的發現

上世紀30年代初，上海的一批僧俗佛教學者朱慶瀾、葉恭綽、丁福寶、范成等組成「影印宋版藏經會」，欲將在西安開元、臥龍兩寺新發現的宋《磧砂藏》影印傳世。但《磧砂藏》本殘缺嚴重，為訪求珍本，補其殘缺，范成法師受命赴山西解州的靜林寺、華州的觀音寺、博愛的月光寺等地訪經，「均無所獲」。蔣維喬《影印宋磧砂藏經始末記》，見《影印宋磧砂藏經》首冊之二）1933年春，他在西安遇到自五臺山歸來的老和尚性空，得知「晉省趙城縣太行山廣勝寺有四大樹古板藏經，卷軸式裝訂」，（范成《歷代刻印大藏經略史》）於是，再赴山西。范法師「循汾水上行，至洪洞千佛寺即得十卷」；待到廣勝寺，實為六大樹為「塵穢封積」的數千卷經卷，使范成法師精神倍增，立即投入整理，經「三十餘日，始有頭緒」，並「分函各處報告」。（蔣維喬《影印宋磧砂藏經始末記》，見《影印宋磧砂藏經》首冊之二）這樣，一部「向所未知」的金代刻藏被披露於世，京津報紙爭先報導，成為一時甚為轟動之事件。1934年秋，著名佛學家歐陽竟無委派弟子蔣唯心再赴廣勝寺「檢校」經卷。蔣唯心閱四十日翻檢

藏經的結果是：「藏經依千字文編帙，自天字至幾字凡六百八十二帙……今檢各帙完整者極少，有全帙俱缺者，綜計原藏應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蓋已殘十之三矣。經皆卷子裝，黃表赤軸，長短大小略有參差，卷首附裝釋迦說法圖一幅」，並撰寫了《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於1934年12月發表在《國風雜誌》第5卷第12號；次年此文又以單行本由支那內學院印行。這部金代刻藏因卷首扉頁畫是一幅標有「趙城縣廣勝寺」題字的釋迦說法圖，故稱名《趙城金藏》。1934年，影印宋版藏經會理事徐鴻寶亦赴趙城，與廣勝寺僧訂立借約，以贈寺一部《磧砂藏》和借資300元為條件，選借「可印之經」運至北平，其中未經傳世的孤本經論撰述46種249卷，由北平圖書館、三時學會和影印宋版藏經會分別編成上、中、下三集，縮印成32開線裝本120冊，以《宋藏遺珍》之名先期發表；另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楞嚴經》，亦由三時學會依原經原大影印了400部，仍為卷軸裝，分藏各大寺院。

原來不為人知的《趙城金藏》一經公諸於世，身價百倍，引起各方人士的注意；加上廣勝寺管理不善，偷竊倒賣之事累有發生，以致數百卷經卷流散社會，僅北平圖書館一家，在抗戰時期從私人手中購得的《趙城金藏》就有192卷。《趙城金藏》的發現也引起了日本行家的注意。1936年，一個日本的所謂「東方考察團」來到趙城，要以22萬銀元收買這部藏經，遭到廣勝寺僧的斷然拒絕。（華磊《趙城金藏六次轉移記》、載《文物天地》1984年第2期）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欲以武力搶奪。中共太岳區第二地委在報告黨中央並得到批准之後，派八路軍戰士，在地方武裝和廣勝寺僧的配合下，在日軍未到達之前，全部運至安全地區。在以後的歲月裏，太岳區黨的各級組織又克服種種困難保護經卷。（《八路軍搶救趙城金藏的新史料》，載《革命史資料》第17期）北平解放後的1949年1月30日，這部藏經安全運交北平圖書館。至此，這一輩聲中外的善本佛藏終於有了它可靠的歸宿，我們也因此能在今天，在國務院的批准下，選用《趙城金藏》作底本重編《中華大藏經》。

1949年運至北京圖書館的《趙城金藏》，根據當時的統計是4330卷又9大包殘卷，抗戰前後，北平圖書館從私人手中購得192卷；全國解放後，個人捐贈國家圖書館而又有案可查者又有159卷；加之近年來又不斷有新的收藏，這樣，北京圖書館目前的收經總數就達到4813卷。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博物館亦有零星收藏，個別經卷還流落海外。據我們近年來的調查，其情況大體如下：上海圖書館20卷；北京大學圖書館6卷；南京博物院6卷；山西省廣勝寺3卷；山西省博物館2卷；廣西省博物館2卷；山西省圖書館1卷；山西省崇善寺1卷；北京故宮博物院1卷；臺灣省中央研究院1卷；德國1卷。1959年，中央政府文化部西藏文物調查團在西藏薩迦寺北寺圖書館又發現了31種555卷金藏印本，這部分金藏印本現移藏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北京大學宿白教授因之撰寫了《趙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並肯定「此藏為元初補雕金藏之印本可以無疑」。（見《現代佛學》1964年第2期）此印本卷末均有如下印經題記：「蒙哥皇帝福蔭裏，燕京南盧龍坊居住奉佛弟子權府張從祿、妻王從惠洎女張氏，感如來之咐囑，賀聖朝之弘恩，發心施財，命工印造釋迦遺法三乘貝葉靈文一大藏，成一黃卷，儲以琅函，安置在京大寶集寺……丙辰年六月朔」。由此知道，西藏發現的《金藏》印本刷印於元憲宗蒙哥六年（1256）；是燕京人張從祿一家施財印造的；印成後安置在燕京大寶集寺。我們把這種印本稱作《金藏大寶集寺本》。

現存北京圖書館的《金藏》印本我們稱作《金藏廣勝寺本》。然而，這4800餘卷經本，其情況多有不同。早在蔣唯心檢校《金藏》時，就發現了10個與多數經卷不同的卷子，它們為「臘黃紙印本，卷軸較大，首蓋「興國院大藏經」方形朱印」。其中「奄」帙《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3第一版後有墨記云：「大金大安元年己巳歲睢州考城縣（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太平興國禪院，建修十方常住雜寶藏經，看檢高流切須護惜……。」（此墨記據蔣文引）此墨記，因現存該卷經一版殘已佚。蔣唯心認為此「興國院本版式為原刻」。我們

將此種印本定名為《金藏興國院本》。根據我們的重新檢索，現存興國院本共有8卷。此外，在現存廣勝寺本中，還有其他印本，如《說無垢稱經》卷2等，種重卷複本，它們雖無興國院本那樣特殊的印章，但與大多數印本仍有精粗之分，我們姑且把它們看作《金藏》的初雕印本，即《金藏天寧寺本》。另外，現存《金藏廣勝寺本》中還夾雜著相當數量的明清兩代的補抄本。據蔣唯心統計，這類補抄本的總數約207卷，但數十年後已有了相當的殘缺，其數量已不足原來的半數。這種補抄本所據底本除個別外均為明《永樂南藏》本。

二、《金藏》的雕刻

《趙城金藏》被作為現代佛教文獻史上的一大發現，這是因為在金元以來的史書雜著中雖然有過幾條有關記載，但不是不被理解，就是作了錯誤的解釋。明朝萬曆年間創刻了一部方冊本大藏經《嘉興藏》。這部藏經的發起人之—明萬歷時任刑部尚書的陸光祖在為《嘉興藏》作的一篇序文中說：「昔有女子崔法珍，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應之者」。（《刻藏緣起》，楊州藏經院本）此處所云崔法珍即《金藏》的發起人和募刻者。但序文沒有指出崔法珍是哪個朝代的人，她所刻藏經又是哪種藏經。這樣，就引起後人的種種猜測：有人說崔法珍乃宋《磧砂藏》刊刻的發起人法成，因為法珍與法成讀音相近；進而又推測說，先有法珍的斷臂募資，後有法成的主持刻藏。（葉恭綽《磧砂延聖院小志》，見《影印宋磧砂藏經》首冊之二）日本學者甚至把崔法珍說成是明代人，其斷臂所刻藏經就是方冊本大藏《嘉興藏》。（日僧隨天《緣山三大藏經緣起》，載《昭和法寶總目錄》第2冊）凡此諸種誤解在《趙城金藏》發現之前一直是作為懸案而無法得到證實。

初步統計，在現存《金藏》印本中，見於卷末或版行間的施經題記約140餘條（不包括原底本即有而照刻者、譯經和進經者提款及刀工題記），其中有年代可考者40餘條。這些題跋提供的情況大致可說明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在趙城廣勝寺發現的大藏經是金代刻造的

從40餘處有記年的刻經題跋中知道，其刻經時代均處在金熙宗至金世宗時期（1139-1172），涉及天眷、皇統、天德、貞元、正隆和大定幾個年號，前後約30年左右。由此肯定其為金代刻藏是毫無疑問的，而30年之數又恰與明陸光祖所述相符。刻經最早的年代是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見「鳴」帙《妙法蓮華經》卷3、卷5、卷6、卷7。這4卷經現存上海圖書館，其中兩卷卷首有「趙城縣廣勝寺」題字的說法圖扉畫，另兩卷扉畫殘缺。這說明這4卷經確為廣勝寺舊物，是現存《趙城金藏》的一部分，何時流落上海不得而知。在卷5、卷7兩卷卷末有「天眷貳年己未六月二十七日印畢」的印經題記，同時有「洪洞縣東尹村李惠濟為母發願印補當縣觀音院法華經」的施經願文及「平陽府洪洞縣經坊街家丁益記」木記。這些題跋說明，此4卷經是洪洞縣東尹村村民施資印造的；印經年代為金熙宗天眷二年，印造地方是洪洞縣經坊。那麼其刻造年代當在天眷二年或此年以前，是目前發現的金代由私人募資刻造的年代最早的幾卷經。值得注意的是，同是「鳴」帙的《妙法蓮華經》在《趙城金藏》中還存有一部相當完整的「卷經」，並在卷之末有一段很長的施經題記：「解州夏縣如古鄉趙村王德並妻李氏同發虔謹，舍淨財大藏經板會下，施財兩千餘貫，奉為先亡祖父祖母……如意吉祥，願四恩三友，法界生靈同成佛果。乙亥十二月八日奉佛男弟子王德施」。乙亥年當是金完顏亮貞元二年（1155），距天眷二年晚16年。無疑這7卷經是整部《金藏》的一部分。那麼天眷二年印造的《妙法蓮華經》與整部《金藏》是什麼關係？首先，這4卷經有千字文編次，这就排

除了單刻本的可能；第二，這卷經的千字文編次與現存《金藏》相符，而區別於同一時代的其他版本的大藏經，如福州版《崇甯藏》為「鳳」帙，稍晚的《毗盧藏》、《資福藏》均與《崇甯藏》同；第三，在當時的洪洞縣，有沒有現成的其他大藏經的現成雕版可供「印補」，而且這一經版的帙號又與《金藏》完全一致，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此只能說這卷經是新雕《金藏》的一部分。蔣唯心把《金藏》雕印的最早年代確定為金皇統九年（1149），其根據是見於「日」帙《大般若經》卷82的卷末題記。從題記中知道，這卷經「河津縣第四都西母村」近30家村民于皇統九年共同施資雕印的。這30家村民還在三年後的天德三年（1151）共同施資雕造了《大般若經》卷87、卷90。除天眷二年、皇統九年及天德三年的題記外，有記年的雕經題記還有天德四年（1152，見《大涅槃經》卷25）；貞元元年（1153，見《瑜伽師地論》卷89）；貞元二年（1154，見《瑜伽師地論》卷48）；貞元二年（1155），見於這一年的共14處，占了全部有記年題記的三分之一，涉及10種重要的大乘經，如《大般若經》、《華嚴經》、《大涅槃經》、《妙法蓮華經》等；正隆二年（1157，見《增一阿含經》卷10等）；正隆三年（1158，見《攝大乘論釋》等）。由此可知，《金藏》的雕經年代比較集中於天德三年至正隆三年（1151-1158）間，此間所刻經論涉及從「宙」帙《大般若經》至「畫」帙《馬鳴菩薩傳》，如果據此推算，可達1000余種4000餘卷，超過了金藏的半數。此後刻經事業又持續了10餘年，直到金大定十三年（1173，見《大乘智印經》卷5題記）前後才告完成。

（二）這部大藏經為私人募資雕刻的私版藏經

《金藏》雕刻的施資者，絕大多數為山西晉南諸縣村民，涉及的地名有蒲州河津；解州夏縣、芮城、安邑；絳

州太平；平陽府洪洞縣、臨汾縣；潞州長子縣、襄垣縣；河中府猗氏縣、萬泉縣、榮河縣；太原府文水縣、平遙縣、平陶；曲沃縣；襄陵縣；南宮縣及陝西華州蒲城縣、美原縣、毗沙鎮等，比較集中于晉西南今屬運城地區的解州的夏縣、安邑及河津等地。在現存全部二〇餘條施經題記中，有明確地名而與解州有關的就有三〇餘處，這說明金代的這次刻藏與解州有著特殊的關係。其中見於二〇處的王德的施經題記最具代表性。王德是夏縣如古鄉的村民，他一家施財二千余貫于「大藏經板會」。這裏提出了這次刻藏的組織——大藏經板會。在「陶」帙《地藏十輪經》卷一的題記中又進一步指出此大藏經板會在天寧寺中，稱「天寧寺開雕大藏經板會」。再從正隆元年刻造的《阿毗達磨界身足論》等經論的幾則題記中知道，此天寧寺當在安邑境內。據《金史·地理志》，安邑為夏縣所屬之鎮，同為解州屬地。解州即今運城市，而運城市又是在原安邑鎮舊地址上發展起來的。由此可知解州，安邑及今之運城市在地理概念上應是同一地區。毫無疑問，《金藏》就是以解州天寧寺為中心，由解州所屬各縣及臨近的長治地區、臨汾地區及晉中太原府所屬個別縣份，也涉及毗鄰的陝西個別地區的農民及其他居民共同施資雕造的。從施資者的身世看，有王德這樣的大戶人家，也有僅能施資雕經一版、二版這樣的貧苦農婦，而比較多的則是數家乃至數十家居民聯合雕經一卷或幾卷；有的貧婦僅能貢獻一把雕經的刀子，有的把自種的樹，自織的布，自養的驢作為資產奉獻出來雕造經板。這些情況充分反映了「當時檀越（施主）有破產鬻兒應之者」的情景。一部多達七千卷的規模宏大的刻藏事業，靠一個地區的百姓出資，非有極大的熱忱和決心是無法辦到的，而沒有一個有這樣決心和獻身精神的組織者也是難以成功的。崔法珍就是這一事業的倡成者，他以「斷臂募刻」的驚人舉動感化人心，最終完成了刻藏願望。

(三)《金藏》的首倡者是潞州人崔法珍

正如蔣文所述：「創此偉業者，寧遂湮沒不彰乎，理決其不然也」。事實上，崔法珍的事蹟並沒有被史書湮沒。清李有棠所撰《金史紀事本末》卷30引《析津志》云：「弘法寺在舊城，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三年（1183）賜紫衣宏教大師。明昌四年（1199）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鳳記，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篆額」。此記載還見於《元一統志》卷1，並被收錄在《永樂大典》卷第4650，其文字與李有棠所引幾乎完全相同，且多了兩句十分重要的內容：「二十一年以經版達于京師。二十三年……以弘法寺收貯經板及弘法寺西地與之」。此記載指出，崔法珍為金代潞州人（今山西長治），她確曾刻過一部藏經，並將印本及經版上送金中央朝廷，並因此受封「宏教大師」，經板收貯於燕京弘法寺。

近年，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宋本《磧砂經》印本「火」帙《大寶積經》卷29卷末發現一則明永樂九年（1411年）釋善恢撰寫的名曰《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一文。此文記述了崔法珍的身世、雕經始末及《金藏》經板的板數、卷數等許多具體內容。此文對瞭解崔法珍雕造《金藏》的經過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現全文載錄於下：

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

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斷臂出家。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始印經一藏進於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經，于大聖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見於宮中尼寺，賜坐設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經，已蒙聖恩，安置名利。所造經板，亦願上進，庶得流布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乃命聖安寺為法珍建壇，落發受具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閣賜五百萬，起運經板。至二十

一年進到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年賜法珍紫衣，號弘教大師。其導遵等，亦賜紫衣德號。其同心協力雕經板楊惠溫等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遂流通焉。建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靈山演法，各隨眾生根器利鈍方便，分別大小乘教，為世津梁，後人因之。識心達本，悟無為法者，不可以數計矣。然教法之興，雖系於人，亦由其時。自漢明帝，曆晉魏以來，雖有釋氏經典，所傳由未廣也。其後，玄奘、義淨兩大士跋涉膠海，至天竺國，不憚艱苦，磨以歲月，得經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備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藍塔廟，或建寶藏，或為轉輪，安置經典，為世福田，若緇若素，書寫受持，頂戴奉行者，無處無之。蓋如來本願，欲使眾生見聞而獲福也。然也弘教大師，備修苦行，以刊鑄藏板為本願，於是協力助緣劉法善等五十餘人，亦皆斷臂。燃臂燃指，剝眼割肝，至有舍家產、鬻男女者，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已。門人慧人等，具言刊經本末，謁文于東平趙風述記，時歲次己丑。仙林講寺祇殿鮑善恢為是本寺藏典缺少，嘗往磧砂、妙嚴二剎印補，見彼經板多有朽爛欠缺，發心備板，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幸獲完備。今善恢自思，刊補小緣，經於歲月，率難成就。想當時弘教大師自幼出家，斷壁設誓，刊刻藏板，始終三十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希有功德，而復遇金世宗敕賜錢及號記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復有是人，有是人復遇是時，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庶不負如來付囑之意。嗚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懼夫久而泯其所由，無傳於世，因而刊之，使後賢觀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師之功也耶！

時永樂九年歲次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萬善戒壇祇殿善恢謹題。

善恢的這一記文記述了這樣一些具體情況：

①崔法珍是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他13歲斷臂出家，立誓雕造藏經，前後30年「方克有成」；「同心協力」雕經者，有楊惠溫等72人；助緣雕經者還有劉法善等50餘人，「亦皆斷臂」。

②《金藏》經板總數為168113片，收錄經籍6980卷。

③《金藏》雕成後，崔法珍等印經一藏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進於朝廷，奉敕安置于大聖安寺；經板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運至京師，安置於大昊天寺，並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5人「校正」。

④金朝廷為表彰崔法珍刻藏的功勞，准其在聖安寺落發為尼，並賜紫衣，號弘法大師；協助雕經者楊惠溫等72人並給戒牒，禮弘法大師為師。

⑤詳述上述刊經本末者是法珍的弟子「門人慧人等」，其所述內容由「東平趙渢」撰碑記之。

這一記文所記內容與《金史記事本末》的記載基本一致，且更加具體，它清楚無誤地指明了崔法珍所刻藏經為《金藏》。進而在現存《金藏》的施經題記中，有明確地址記載而涉及潞州者達15處之多，說明潞州的百姓曾是《金藏》雕印的最虔誠的贊助者之一，我們有理由說，在同一時期由崔法珍領頭向金中央朝廷呈送的大藏經經板及印本只能是包括潞州在內的晉南百姓共同出資出力雕造的《金藏》。所謂崔法珍所刻藏經為《磧砂藏》是純屬猜測。《磧砂藏》始刻於南宋紹定年間（約1231），經宋元兩代近一個世紀才完工，刻經地址始終在江蘇吳縣的磧砂延聖院，這與金代潞州人崔法珍在山西晉南刻造的《金藏》完全是兩回事。

三、《金藏》的補雕

在宋代，自經版運至燕京弘法寺後，有明確記載的印經活動至少有過兩次：一次是金大定二十九年（1186），事載趙溥撰《濟州普照寺照公禪師塔銘》：「聞京師弘法有藏教版，當往彼印之，即日啟行，遂至其寺，凡用錢二百萬有畸，得金文二全藏以歸，一寶輪藏黃卷赤軸……」（《山左金石志》，見《石刻史料新編》第20冊）；一次是金大安元年（1209），文見《金藏》「奄」帙《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3的印經墨記，此次留下了部分印本，即金藏興國院本。時至元初，弘法寺經版已有部分損壞，於是有了《金藏》的補雕之事。補雕《金藏》在現存《金藏》的題記中有明確記載，如《四分律》卷2、卷5、卷9之末均有如下尾題：「宣差大名府達魯花赤納憐蒙古提舉補修雕造」（卷9略有不同，「提舉補修」作「管」），內容相同的題記還見於《阿毗達磨俱舍論》卷19。從這則題記推算，這次補雕《金藏》事當在1224—1271年蒙古滅宋前這段時間。（達魯花赤初設置於1224年，1271年滅宋前，蒙古未有年號）在《金藏》題記中屬於這一時期有記年的題記還有6則，其中的4則分別見於《瑜伽師地論》的卷56、卷58、卷97的版行間或卷末，同記於蒙古壬寅年（1242），即元太宗窩闊台去世，皇后乃馬真稱制之年。另兩則，一為戊戌年（1238），見《阿毗達磨顯宗論》卷1，一為癸卯年（1243），見《攝大乘論釋》卷4。從題記看，比較集中的年代是壬寅年前後。然而，關於此次補雕《金藏》到底始於何時，由誰主持尚有不同的記載。元釋祥邁所撰《至元辨偽錄》卷5載：「大元啟祚，眷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補雕藏經」；《湛然居士文集》卷14收錄了耶律楚材的一首題為「補大藏經板疏」的詩。此詩云：「十年天下滿兵埃，

可惜經文半劫灰。欲析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這說明補雕《金藏》事當始于元太宗時，由元太宗發起，耶律楚才可能實主其事。耶律楚材在燕京攻陷後降蒙古，一直隨侍成吉思汗，蒙古太宗四年（1231）封中書令，乃馬真氏稱制時亦在位，病逝於癸卯年（1243）。耶律楚材晚年十分重視文化事業及經籍的整理。蒙古太宗八年（1236）他曾「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于陽平，編輯經史」；（《元史》卷二）同年，他又在蒙古太宗的同意下「校試」「儒士于諸路」，得士「凡四千三百人」。（《綱鑑易知錄》卷87）由此推論，說耶律楚才主持補雕《金藏》是近於事實的。還有一種記載，即發現于河北曲陽縣永寧寺的《山前等路僧尼都提領賜紫覺辨大師源公塔銘》（碑文載《石刻史料新編》第24冊）所云：「都城洪法寺補修藏經板，以師為提領，三年雕全，師之力居多焉」。此碑為「山泉野衲志連」撰文，立於「大朝戊子歲十一月初五」。此碑文中還有「承安三年（1198）送恒陽修德寺，禮遷菩薩為師剃發」及「師壽八十有五，坐四十年，丙午年六月上旬化」之句。《曲陽縣志》的作者據此推算「大朝戊子年」是距承安三年約30年的金正大五年（1228），即成吉思汗去世的第二年。是年，其四子拖雷監國，蒙古太宗尚未立汗。這一記載明確指出了元初在燕京弘法寺補雕藏經這一歷史實事，但在時間上卻與上述大有出入，似乎此次補雕經版不僅開始于元太祖之時，且已補雕完工。這無疑與現存《金藏》所反映的實際補雕的年代是不相符合的。這次補雕《金藏》是一次規模較大的行動，正如耶律楚材所述，是廣集「世間」之財而開展的一次由當局組織的活動。從現存《金藏》中有關補雕經版的題記中知道，這次補雕集中了元初地屬中書省，即今天的河北、山西、山東及遼寧幾省數十所大寺院的雕經僧人。在施資人中也不再是初刻時晉南地方的一般普通村民，一些地方的高級長官，如「宣差大名府達魯花赤納憐」、「平州路行省相公劉夫人祥融及六姐祥最」、「平州路都功德王達魯花赤行省萬戶相公祥崇」等參予其事並「助緣」「施財」。（見《金藏》：《四分律》、《解節經》、《摩利支天陀羅尼》諸經題記）

如果不是政府組織，集中如此廣大地域的僧人是不可能的，地方長官也不可能出面。

四、《金藏》的校補與《弘法藏》

《金藏》經過蒙古太宗時期的補雕後，曾有過印本行世，這就是金藏大寶集寺本。我們在編輯《中華大藏經》的過程中發現它與金藏廣勝寺本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如《大般若經》，大寶集寺本共存十二卷，從千字文編次到版式與廣勝寺本完全相同，凡有題記之處，兩本完全一致。又如《放光般若經》為20卷；《摩訶般若經》為27卷，這是《金藏》與其他諸版大藏在分卷上不同的地方，兩本全同。還如刻工題記及特殊版刻記號，兩本亦完全吻合等等。這說明，它們同是初刻于晉南而後補雕於燕京弘法寺的《金藏》印本。大寶集寺本何以會運往西藏又恰恰藏於薩迦寺，雖無明確記載，但仍有「蛛絲馬跡」可供「追尋」。（宿白撰《趙城金藏與弘法藏》）薩迦寺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主寺。在薩迦派傳承的歷史上八思巴是一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是它的第五代祖師。據《佛祖歷代通載》載：八思巴十五歲就已進入忽必烈的幕府，並受到蒙古最高統治者的尊寵，「戊午（1258）師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經，憲宗皇帝（即蒙哥）詔師剖析是非……庚申（1260）師年二十二歲，世祖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王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期月召還。庚午（1270）師年三十一歲……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旋又西歸」。（《佛祖歷年通載》卷32）八思巴尊寵于憲宗和世祖兩代，他兩次「西歸」返藏之際，正是弘法寺《金藏》補雕完成之時。從八思巴兩次返藏的時間看，從八思巴與薩迦寺的關係說，大寶集寺的《金藏》印本只能是由八思巴帶回薩迦寺的。

金藏大寶集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1256），表明《金藏》的補雕此時已經完成。這樣一來就又有了一次《金藏》的校補問題，其緣由是來自如下的記載。《佛祖歷代通載》卷22引《弘教集》云：「弘法寺藏經經版歷年久遠，（世祖）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鼎新嚴飾補足，以傳無窮」；「帝命高僧大德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遍佈天下」；「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至化，帝印大藏三十六藏，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這一記載還見於《釋氏稽古略續集》卷1，文字大同小異。這些記載說明，繼元太宗補雕《金藏》之後，元世祖時又進行了一次校補《金藏》的工作。關於這次校補的情況，宿白教授在《趙城金藏和弘法藏》一文中作了如下論述？他認為元世祖「校補舊藏之主要措施，似有三端」，1.「增錄了自景祐以來新出及前錄未編諸經律論」，即《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以下略稱《至元錄》）卷1所云「弘法人藏錄及拾遺編人經律論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六卷」；2.進行了「蕃漢對勘」，並得出「是說者多謂《至元錄》即世祖校補弘法舊版後之詳目，亦即元弘法藏，當可信從」的結論；3.「重整次第，再標芳號」，其結果是編定了《至元錄》。宿白教授的論述為瞭解元世祖時校補《金藏》的情況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啟示。我們據此以現存《金藏》進行了核對。在核對中發現，《至元錄》所云「弘法人藏錄及拾遺編人經律論七十五部二百五十七卷」與現存《金藏》的實際情況並不是一致的。在《至元錄》的其他各卷中，上述諸經律論都有細目，比如小乘論的2種10卷見卷9，《金藏》只有一種《施設論》，千字文編次也不同；小乘律的9種52卷見卷8，《金藏》皆無；大乘論的6種61卷見卷9，《金藏》只有3種等等。此外，《至元錄》卷10的最後一節細目稱作「弘法人藏錄所記東土聖賢集」，所錄經籍共22帙79種，其中的61種見於現存《金藏》，約占人藏錄的80%左右，另外的18種有4種見《高麗藏》，即《一切經音義》、《續一切經音義》、《法琳別傳》和《貞元續開元釋教錄》；2種見《房山石經》，即《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和《一切佛菩薩名集》；2種見明清版大藏，即《注維摩詰